

《拯救与逍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拯救与逍遥》

13位ISBN编号：9787208001626

10位ISBN编号：7208001626

出版时间：1988-4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刘小枫

页数：54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拯救与逍遥》

内容概要

这本书是一次中西思想史的巡礼和对话。中西文化精神的品质存在巨大差异，它们并不能互译，最为根本性的不同就是拯救与逍遥。中国精神中，恬然之乐的道遥是最高精神的境界，孔子也说“吾与点也”。佛道更不必说。而西方精神，受难的人类通过耶稣基督的上帝之爱而得拯救，人与亲临苦难深渊的上帝重新和好是最高境界。这两种精神品质的差异乃是“乐惠文化”（李泽厚语）与“罪恶”“爱恶”文化，超脱与救赎的精神冲突。本书是在救赎与超脱，拯救与逍遥这两种不同的精神方式之间展开的这场精神冲突的对话。

《拯救与逍遥》

作者简介

刘小枫,1956年生,四川重庆人。1978年入四川外语学院,获文学士学位;1982年入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深圳大学中文系任教;1989年入瑞士巴塞尔大学,获神学博士学位。1993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总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研究员。

精彩短评

- 1、书评都在书上了。迄今为止念得最痛快淋漓的一本书了，一边看一边写旁注，感觉就在直接和作者对话一样的，一个人忙前忙后，拆了一招又去想作者的对招，不亦乐乎。少一颗星，因为不认同结论。但是他的说服力太迷人了！
- 2、读的太快
- 3、这个版本不那么神神叨叨~
- 4、有点吃力的阅读体验
- 5、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四块六，这是原版，后来的修订版在原版基础上重写了。
- 6、书写的很大，可能那时的他太急于出名或表达了。读书不多的人一碰感觉特好，但是随着读书量越多就发现这书误人太深。
- 7、脆黄的纸页，有一定年纪的书，捧在手里觉得很有质感，看了许久只看懂了一些些，但这真的是本深刻的书。。。
- 8、或许是近代以来，第一部彻底的虚无主义宣言。
- 9、我都快忘了这本书讲啥了。。这书读的，，
- 10、读88年版感觉锋芒毕露
- 11、接受某种善的绝对价值的存在，以理性超越理性自身，这种超越不是弃绝理性，而是规定理性自身的界限。拒斥不应是无条件的，正如确信不应是无条件的。这是作者的核心观点。对于中西传统中的资源/缺陷同样进行整理，中国的传统实践理性在这种比对中显出虚妄，而西方的虚无主义虽然比前者高一层次，有前者所无，却也走向另一种虚妄，虽然比起前者层次略高一筹。归结到最后，这两种形式的虚妄都是其取消了一种绝对的善的价值与信仰所致，由此显明理性自然先应具有，然而也还须明确自身的界限，理性之上应当有一个超越的价值。最终的善既非逍遥的自由，也不是担当恶与荒诞的自由，而是爱与信仰。不过说回来，作者偏重宗教大概也是一种局限，相比之下我更认同政治哲学、伦理学中的价值作为一种至善的追求，毕竟中国没有基督教那样的宗教。
- 12、作者功力深厚~~~很多观点足够开拓视野
- 13、虽然他说应把比较的二者置于同等虚妄的状态，但好歹是思辨完成后再成书，行文还是妥妥地尊基督和超验，以西哲之思辨拷问庄老的正当性，那结果不言自明
- 14、一种自恃的感觉，有气势。有立场，所以有感情，有决断。人不能自觉，不能自决，上帝是最好的实体存在。可以理解。
- 15、如此美妙的文笔，设计中西众多诗人哲人，一本书，涵盖了千年思想。庄禅哲学略显粗略
- 16、挂羊头卖狗肉，就是讲哲学的嘛。不过对鲁迅的评价实在够味，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 17、多遍
- 18、随便扫到了第51页，人家二贤人的死亡原因是你说的这样吗？简直岂有此理！
- 19、在中西对话中消弭中国传统儒释道？
- 20、出于要理解自杀问题而读这本书，但觉得过于掉书袋了
- 21、八十年代偏好大题目，东西比较文化，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等等等等，在“他者”的凝视下进行自我想象
- 22、无空 仅浏览之
- 23、已经到了，任何将父性转化为妇性的，都将进行清场，一如现在躲在女人背后的兽群们，王婆背后的衰弱物们，再祭祀时，不容一丝女人，祭祀完成之后，所有都交付女儿，我见过伦理如此原谅，亲爱的康德，繁荣的美利坚，让我们把科学彻底的举起来吧
- 24、虽然写得很好，完全没法接受，尤其是对鲁迅的阐释，谬论颇多，难以想象这一章真的是按刘所说的“逻辑的展开”写成的。刘的文字实在漂亮，渊博深邃也为时人所不及，因此屡屡出现的明显逻辑错误更令人难以忍受。我不能评价什么，因为这种超验的爱感意向是不能用逻辑来论证的，只能在一个个地暴露对手们的“丑态”中模糊地彰显其自身。其实昨天刚读的汪晖的文本细读和刘的风格有点像，将文学直接当成思想史的材料进行分析的缺陷两者也同样具备。
- 25、据说这是原版，后来改了好多，当然，不管怎么改，傻逼本性改不了。
- 26、1，他是一个天才。2，喜欢这种有点目空一切自我批判态度。3，文学特别是诗歌，今后需要从更高的高度去分析，比如哲学。4，原来庄子式出世的立场这么冷酷无情，还是做一个人道主义

《拯救与逍遥》

者吧，至死不渝地追寻圣爱的光辉。

27、大三的时候读的。我当年还真是喜欢精神自虐啊。。。

28、以诗的语言写的哲学

29、读大学期间在武昌司门口靠教堂边上的一个书店买的，估计那个书店现在不在了。

30、五行打给文采，作者的文采实在是让人着迷

31、为数不多的可以打五星的书

32、正在读07版，不过对这个简短的版本印象极好。

33、对我影响很大的一本书。

1、重新翻刘小枫《拯救与逍遥》，昔日读此书的激动已经不再，留下的是一种激情的灰烬。八十年代的文章受到李泽厚浮华文风的影响，刘小枫也不例外，他的文章充满了古今中外的广征博引，深刻的主题被驳杂的引用所遮掩。不过说回来，八十年代还是给青年学者很大的发展空间，不必思考写作格式要求，而是尽力进行思想表达。这种顺畅的表达，让很多问题真正能够浮现到历史舞台。刘小枫这部《拯救与逍遥》就是在对自我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现代性批判问题。在读《诗化哲学》的时候，就能看到刘小枫通过梳理浪漫主义哲学对于现代性所展开的批判，这个立场有别于八十年代启蒙哲学的氛围。在《拯救与逍遥》中，刘小枫在深入西方思想传统的同时，扬弃了浪漫主义哲学立场。刘小枫在展开对中国浪漫主义传统批判之前，首先树立了一个传统靶子——儒家传统。将儒家传统视作世俗哲学，并对其进行人性论的批判，这自然就是浪漫主义叙事的开端。当然，这种中国思想的叙事，是通过一个引言，即诗人与死亡展开的。在《诗化哲学》中，刘小枫提出了二十世纪是残酷的世纪，是诗人自杀最多的时代，也是人性败坏的时代。那么，背后就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即现代性扼杀人的灵性，诗人不得不选择死亡。这个命题，让刘小枫找到了中国思想的叙事起点。屈原死于政治与儒家伦理的彷徨，是浪漫对于政治现实的否定，或者人性对于兽性的反问？诗歌传统确实存在浪漫主义倾向，刘小枫将其作为对于现实政治的否定，则未免过分用拔高中国诗歌传统的嫌疑，或者用德国浪漫主义置换了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浪漫因素。当然，刘小枫这种置换是隐藏在其叙事之中，这种通过浪漫主义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其实与德国浪漫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拒绝，是同一种思维的产物。当然，这种浪漫主义被追溯为屈原天问、庄禅的逃逸、曹雪芹的红楼说梦，鲁迅的冷眼观世，总之又是粗线条地将中国浪漫主义拉了出来。但是，刘小枫并未如《诗化哲学》停止于此，而是将中国浪漫主义与西方神学加以对比。这种对比，应该是类似于釜底抽薪。本来以为刘小枫不过是做了一个中国版的《诗化哲学》，结果却是通过神学对浪漫主义的否定。这让八十年代美学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或者刘小枫所说的“四五”一代人惊愕不已。我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现了刘小枫并非是简单追求神学，而是回到了《诗化哲学》中存在性的追问，在有限与无限的追问之中，他开始了个体与上帝之思。人终免不了一死，哪怕是诗人或者艺术，都会因为时间而腐朽。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不朽？存在主义只是暗示了存在，并没有真正回答。刘小枫的追问，必将回到上帝的永恒。上帝的救赎，让刘小枫找到了新的超越维度，超越理性（儒家）的世俗，超越诗化哲学的永恒，只有上帝才是永恒的不朽，人只有认知上帝，才能与上帝永恒。这种追问，导致他对于中国浪漫主义或者德国浪漫主义的否定，在自我否定中，他走向了神学。有些人曾经说刘小枫是二道贩子，不断跳槽者，却不曾被这种存在主义的追问所困扰。究竟在我们当下的亲在后，是否存在永恒的不朽，这才是他不断追求的真理所在。就像下一本书《走向十字架的真理》所暗示，他是一个不断追求真理的存在。在不断追求过程中，他拣尽寒枝不肯栖！

2、西闪/文八十年代末的夏天，我站在新华书店的开架书柜前，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读完了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作为一个高三学生，四块六的书价可是不菲。在那个时代，一个中学生阅读这样一本书并不特别，至少我知道，在我的同学中间不乏尼采、海德格尔和萨特的爱好者——没人敢说读懂了他们，但现在想起来，阅读这件事本身已让我们受益匪浅。如今来评判那些著述，尤其是改革开放前十年的那些著述，如果不持一种多少有些成王败寇的心态，往往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因为很有可能，当时反响巨大的书其影响力不一定能持续到今天，反之，当时并不很“红”的著作很可能在数年乃至十数年后才被奉为经典。历史的巨手翻云覆雨，厚古薄今和与时俱进都不见得完全正确。当今天我们抛却时间的序列就会发现，在《美学散步》（宗白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与《美的历程》（李泽厚著，文物出版社，1981）间，在《随想录》（巴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与《傅雷家书》（傅敏编，三联书店，1984）间，在《人啊，人！》（戴厚英著，花城出版社，1980）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著，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间，是否存在内在价值的高低值得研究。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算得上一个异数。在总体上，中国的近三十年历程被视为一个自上而下的体制改革时期。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观念上的变化相当程度上也是自上而下发动的：改革的发动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著名主张，开始告别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主义理想，转而寻求一条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诉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它要求全社会的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事实上也规定了以1978年为标志的上世纪80年代早中期中国人观念变化的主要内容。这个被后来

的学者称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时期，其主要任务是配合现代化建设进行“生产力”在观念上的解放，或者进一步讲是将“人”从政治人还原为经济人的一次不彻底的解放。在文化和思想领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它们所衍生的影视作品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刘心武的《班主任》、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古华的《芙蓉镇》、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新星》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无论“伤痕”、“反思”还是“改革”，为当时的人们在观念上冲决僵化教条的樊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思想解放运动自上而下的固有特征，这些创作往往并没有一个生老病死的自然过程，它们的出现和结束都被外在的力量决定了。而它们所暴露出的肤浅、狭隘、软弱与不彻底也相应地在人们的观念中显现，以至于有人认为它们要为当时以世俗导向的实用主义负上责任，而忽视了它们同样是观念本身。大概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体制留给观念变革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基本上以政治观念改造为核心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呈现出疲态。但是循着它的逻辑演进，观念变革开始在政治之外以及体制边缘寻找发展的途径。这时候，已经批量进入读者视野的西方文学作品和学术著述经过一番消化，开始以“本土化”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这种本土化，实际上是一次将西方现代性观念与本土经验相结合的实验。这一次，“文化”取代了“政治”，成为所谓新一轮启蒙运动的关键词。在文学方面，经历了一番思想上的激越之后，不少作家感到所谓“文化”对人类的深刻影响，其中以韩少功、阿城等人开启的“寻根”文学令人瞩目。早在1985年，韩少功就在一篇题为《文学的“根”》的纲领性论文中谈到：“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当中”，以此“立足现实”，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韩少功的《爸爸爸》以及阿城的《棋王》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之作。在学术方面，学者们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例如甘阳就提出：“中国要走向世界，理所当然地要使中国的文化也走向世界。”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是有识之士的共同信念，也是“当代中国伟大历史腾飞的逻辑必然”。（《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三联书店）从现在看来，与思想解放运动相比，新启蒙运动更具有民间色彩。在这场运动中，有三个文化学术团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分别是“走向未来”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和中国文化书院。以刘小枫、甘阳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逐渐成为观念变革的中坚力量，与这三个文化学术团体的成立以及它们的出版物密不可分。事实上，如果不对当时那段观念变革的历史进行相当篇幅的回顾，就很难完全读懂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所主编的人文研究丛书之一，《拯救与逍遥》是那场新启蒙运动的学术代表作。将《拯救与逍遥》视为新启蒙运动的学术代表作，首先是因为它与当时的主要著述共有的问题意识。正如刘小枫在该书的修订版序言中所说：“不断在欧洲小说和哲学中寻找某种东西，心中挂念的仍然是相当含糊的‘中国问题’。”关于这个所谓的“中国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表述，它时而被描述成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话语的对应，时而被比喻为民族之间的角力，时而被概括为东西方的文明冲突，但有一事实为大家所公认，用刘小枫的话说，这一事实就是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相遇，它是“中国问题”的实质。以“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为例，甘阳、刘小枫、陈平原、李银河、陈嘉映、钱理群等人，这些主要来自北京大学人文学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们高举人文主义的旗帜，引进西方各种思潮，同时开始通过一些形式上的整合，用以分析中国各种具体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所着眼的无非是这个“中国问题”。譬如，杜小真的《一个绝望着的希望——萨特引论》、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等都是当时的成果。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些作品无论在技巧的成熟度上，还是在方法论的自觉性上都无法与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相比，因而无法取得同样的学术地位，也没有产生与之相当的影响力。当然，技巧上的成熟度、方法论的自觉性尚不能说明《拯救与逍遥》的优秀。在探究“中国问题”时的思考路径上，刘小枫可谓独树一帜。在这个“中国问题”的结论上，刘小枫也得出了迥然不同于众人的答案。这使得《拯救与逍遥》既是新启蒙运动的代表作，也成为反思启蒙反思现代性的处女作。何光沪先生当年在读了《拯救与逍遥》后写了一篇评论，他称赞该书内容丰富，洞察深刻，“不仅在内容上跨越古今中外的艺术意境和文学、社会心理和哲学、宗教精神和神学，而且穿透这些文化、意识形式的厚重沉积，直抵其核心深处的社会、历史和人生的最根本问题”，是一部关于苦难、超越与爱的大书。（《这个世界最需要爱》）同时，他又认为书中文句带有当代青年特有的稚气，表述也颇有不严谨之处。但是从现在看来，当时的刘小枫是否真的抵达了人类问题的最深处可能值得怀疑，但是他在整部著作中敢于用一种二元对立的角度的角度，以基督教化的所谓绝对价值猛烈攻击虚无主义（这是我很难以认可的）的中国传统道德，所体现的那种堂吉诃德式的视野与勇气都是极少见的。可以这么说，与刘小枫的才华相比，他在思想上的早熟令人更加吃惊。事实上，《拯救与逍遥》不仅是新启蒙主义的代表作，也是反启蒙主义

的先声。就像他自己所说，《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时期的刘小枫还不能摆脱企图融贯中西思想的“窠臼”，而在写作《拯救与逍遥》时他已经获得了某种恒定乃至绝对的价值立场。他将其称为基督信仰。须知，当时的刘小枫不过30岁。很显然，思想上的早熟赋予了《拯救与逍遥》既洒脱又激越的气质——例如书中他对鲁迅的尖锐批评，不仅乐黛云先生这样的宽厚学者感到愤怒，据我所知，也令当时不少读者深感震撼。一定程度上讲，这就是《拯救与逍遥》的迷人之处。有意思的是，《拯救与逍遥》的早熟气质似乎暗合了命运的跌宕。当此书1988年初版时，恐怕作者本人并没有想到那个意气风发的时代即将被迫中断，而“拯救与逍遥”的主题不仅意外地为那一时期的文化讨论划上了句号，也以它内在的反启蒙主题预告了今后中国观念变革中一段沉寂寥落的路。遽变的时局将本应引发更多热议的《拯救与逍遥》尘封起来，一转眼就是十三年。等到2001年《拯救与逍遥》推出修订本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经历了人文精神的讨论、国学热以及“左右”之辩，特别是经历了更为深广的全球化，当年的《拯救与逍遥》越来越像一个遥远的神话了。此时刘小枫对它进行的大幅度删改，乃至重写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次修订中，刘小枫放弃了“比较诗学”的说法，更为直接地将中国传统的超脱精神与西方传统的救赎精神视为相互对立的“精神冲突”。同时，他一方面降低了批判儒家文化的音调，另一方面增强了批判现代虚无主义（无论中西）的力度。从前的慷慨洒脱消失了，一变成了沉稳持重。字里行间，昂扬与激越似乎也变为自信与优雅。有趣的是，这本修订过的《拯救与逍遥》比起当年的初版引起了更多的关注与追捧，令我颇有时空错位之感。是的，时隔多年，尽管拯救与逍遥这个主题总能唤起读者对探寻生命价值与意义的热情，但作者本人的关注点早已不在此。以至于我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本修订过的《拯救与逍遥》还是原来的那本书吗？因为在我看来，在1988年初版的《拯救与逍遥》里，刘小枫曾经有过一个中国人的“中国问题”，但他现在有的，如果不能说是一个西方人的中国问题的话，那么称为一个基督徒的中国问题大致是合适的。就像刘小枫在修订本序言中所透露的心声：“如果将来真的重写‘拯救与逍遥’，我也许会命名为‘逍遥与拯救’。”在这30年中要数出一些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书并不难，但要找到像《拯救与逍遥》这种具有持续影响力的书却是不易。没读过2007年再版的此书，但我相信，未来30年，拯救与逍遥这一主题还将具有持久的魅力。

3、成书于八十年代末的《拯救与逍遥》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学术随笔。洋洋洒洒四十余万字超越了一般学术随笔的规模，而作者在后记中透露，这已经是割爱舍弃两章的结果。不同于学术专著的语言规范，本文大量运用了咄咄逼人的反诘，乃至于讽刺，以批判悖谬和虚无的价值意义，肯定基督教超验的爱感的唯一价值规定。值得注意的是，本书通篇都建立在对价值的追问之上，作者的预设立场是价值的意义，而从充盈着爱感的价值出发苦难、罪恶都是不可视而不见的，是人类必须正视并有价值统摄来关怀的。诚如作者所言，这场关于价值现象学的漫长比较归结于诗人的情怀，因为理性无法超越边界到达超验、虚无主义无法建筑永恒的价值，因而关于拯救与逍遥的对话仍无法走向和解。对于中西方诗人的价值态度进行讨论、比较的前提就是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可以共融共通，由于相对价值优劣的文化评价标准的存在，涵化不仅是合理的甚至是必须的。为了论证这一前提，刘小枫抨击了文化人类学所强调的历史理性的不可逾越性，在观察历史发展时，作者甚至将文化的中断归因于文化本身的内在要求，而这种对文化人类学的批评出发点仍然难逃基督宗教所建立的价值标准。儒家的内圣外王的“德感”文化首先被作者的剖析，其论述无异于所谓儒学的政教合一造成的个体道德与社会的扭曲，然而作者因儒学中超验的缺失而并不承认其宗教性。并将李泽厚所谓儒学“宗教性私德”与“社会性功德”在宋明理学之后的混杂追溯到孔子的以仁释礼，认为个体人格与社会秩序在儒学的最初经典之中已然合二为一。儒学不可谓价值虚无，但是这种“王道”和伦常的价值在历史中又造就了如此之多的个体的屈从、黑暗与虚伪，造就了屈原的悲泣与天问的无解。缺乏超验的天问不可能有答案，缺乏超验的儒学价值也注定不是绝对的。而承接儒学入世的失意的是以逍遥为宗的道家思想。从庙堂到山野，刘认为有内在的必然逻辑联系。所谓乐感源自于儒家对个体人格的高扬，而在道家发展为了个体生命的逍遥状态。儒家、道家由此构成了一个儒道循环：中国诗人的喟叹追求从人性的社会（原人性）发展为历史自足性（人性），然后退守到人的本然自足性（原人性），始终没有像犹太-基督教文化一样实现由人性向神性的超越。而这种人的本然自足代表着对世间苦难、泪水的模式，是一种无价值、非价值，甚至可以承接西方的虚无主义。这在饱受爱感充盈的基督教情怀眼中是令人恐怖的冷漠，是人的堕落，是对上帝的背弃。直至《红楼梦》对庄禅精神的进一步推进，红楼世界中所塑造的“新人”在对纲常伦理的背弃之外又提出了“情性”的价值，在我看来，这种情性实际上是对女性的审美，是区别与乐感的美感。但这种美感在污浊的世界中却无法永恒，甚至命中注定受到污损，最

终凋零。对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性逻辑，人的本然情感源自于无意义的自然（低于神甚至低于人的理性），这种存在于本人情感的美是脆弱的，最终会被自然本身吞没。红楼这种对美感的爱不同于基督教超验的圣爱，最终造成了曹雪芹“情性”价值建立的失败，“新人”最终不得不重新返空，一桩红楼情案就此终结。让我们回到作者至始至终作为比较对象的犹太-基督教的爱感之中，看看其绝对价值的确立。早期基督教思想认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赋予了自由的意志，这就是在善与恶之间选择的能力，它是理性的灵魂难能可贵之处，也是人性的尊严与价值所在。在作者看来，基督教（此处应指教义）并不意味着对人的奴役，他并不否定人的理智的意义，同时强调人的理智的界限——经验，理智永远无法跨越经验而去检验超验的神的存在与否。这就是作者对于西方理性主义的对上帝的否定的质疑。神性是超然于道德性之上的绝对存在，不是来自与人伦、社会关系，而是来自于圣爱，是苦难的世界唯一可以信仰的价值依据。现代虚无主义背弃上帝而在荒诞世界中追逐个体的自由，萨特和加缪（某段时期）看到了世界的荒诞，在荒诞之下只有寻找个体本然生命的肯定，或自杀（出走），或以恶反抗荒诞的世界。而这二者从绝对价值的角度来看都是对现实的逃避和冷漠。作者认为西方诗人的超验之问本身可贵，从超验之问的辩驳之中实现了个体信念的相互超越，诗人都是黑暗世界的觉醒者，真正的分歧是面对苦难世界应该又绝望走向绝望的深渊还是走向希望的险峰，作者的态度是认同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对虚无主义的抗拒。并不是从经验世界去证明超验的存在，而是经验存在的意义的实现需要超验的存在。海德格尔的临终之言是我们不能把上帝思想出来，而是能唤起期待。实际上对上帝的信仰就被置换为了对上帝的期待，因而无需也无法用理性来推定上帝的存在。刘的全部论断都建立在一种对绝对价值的期待的情怀之上，虽不能证明这种绝对价值的存在，但唯有这种绝对价值存在，人的存在才能够有意义，世界的黑暗和苦难才有希望消弭，个人才能够在痛苦之中得到慰藉。回望这场由当代学人组织的跨越古今中外的对话，作者立足于东方，全书渗透着其对爱感的迫切呼唤，对绝对价值建立的渴望。思辨的结论总是显得有些讽刺。部分无神论者对上帝的斥拒源自于无法接受充满爱感上帝所创造的的世界竟是如此丑恶、黑暗，而恰恰是人和世界的残缺与不满呼唤上帝所建立的绝对价值必须存在。

4、唉，考完研至今没有背过书，也没怎么正经读书，今日反倒有种“涤除玄鉴”之感。比如，刘小枫教授的这书就被我从一流著作中拉扯下来了，可我曾经是多么迷恋这书啊……岁月催人老啊……咳咳，刘小枫想凭借基督教的圣爱和拯救强压中国的天道，在如今的我看来，简直笑话。经验不同，导致进入绝对（此处为名词）的门径不同。比如犹太人对绝对的经验是上帝，中国人是“天”，正是因为犹太人的旷野经验与中国人的山水经验的区别，而二者在更超验的维度上或许是同一的。西方人不同于犹太人，缺乏对上帝的直接感知，因而需要基督做中介，也正是因为这一中介，大开“方便之门”。基督教的上帝绝不同于犹太人经验的耶和華，但更超验的意义上或是同一的。刘小枫想打掉天道的超验性实在太过大胆，他过于决绝的超验立场使得他无法旁窥他道，缺乏真正的宽容。拯救并不高于逍遥。

5、最早读刘小枫的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印象很深。最近看了80年代台湾版本的《逍遥与拯救》，感觉虽有很多精辟的论述，但他基本站在基督教哲学的立场上，很多立论并未摆脱善与恶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所以对佛教和道教的一些论述有失偏颇。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他对中庸之道的重视和理解还不够；第二他对相对性（即佛教所谓的“参”的重视也不够。）比如讲到中国道教并不能用其自身的主张来简单解释，而是需要把它和儒家和法家以及后来的佛家视为一个体系来解释，简而言之，意义是在相对性中呈现的。而且人并不是按一种观点去活的。我们期待爱，但爱并不是生活唯一的意义之源，逍遥与拯救也不是。

章节试读

1、《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75页

17. 这就是诗人自杀的意义：它恳求所有侥幸活下来的诗人们想一想，什么才是终极的意义和价值；想一想自己所具有的信念是否是真实的、可靠的。

2、《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15页

5. 如果意向时间的价值或意义已经确立，我们大可不必再来进行这场追问意义的交谈。事实上，自上个世纪以来，中西方历史文化中的传统价值都遭到并非完全无理的否定。现时历史中的意向无法容忍历史文化中掩盖着的非人的严酷的历史事实，无法容忍历史文化中的某些伪意义、伪理想导致的令人恐怖、令人发指的后果，无法容忍历史文化中的传统价值意向对现时历史中的疯狂与混乱的无力解决。正因为如此，与历史中的文化的对话，中西传统文化之间的对话才成为现时意向的必然要求。

3、《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531页

36. 每一时代都有纠缠着这一时代的整体灵魂的基本问题。有太多的事实表明，纠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之一即是虚无主义。

4、《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105页

18. 人道主义听起来都十分顺耳，但要看在以什么根据为前提的人道主义，那种把人分为等级、种类的人道主义和那种把人视为虚无而确立一切人的绝对放纵的人道主义，实质上都是魔道主义，它允许一种（级）人摆弄另一种（级）人。

5、《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413页

31. 在此我们不可忽略一个问题，肩起黑暗的闸门是否必然导致心灵的黑暗。事实上，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并找不到必然的逻辑联系。如果肩起黑暗的闸门的心灵本身不是黑暗的，它本身就纯净，透明，情形恐怕不会一样。

6、《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534页

41. “五四”一代和“四五”一代毕竟有其共同的一致性，这就是所遭遇的巨大历史苦难给这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打下的深痛烙印。面对历史的不幸、灾难和荒唐，这两代知识分子都被迫带着苦涩的内心去追寻真实的终极价值。

7、《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162页

20. 在人的理性之外，还存在着更高的理智之眼，即属于于神性的理智(intellectus)，它与永恒性有关，超越于宇宙的范围以灵魂的纯粹直观把握普遍必然的单一形式。人必须把自己的理性植根于神性的理智直观，才能摆脱盲目和偏见。优越越的认知力包含低级的认知力，低级的认知力却不能超逾高一级的认知力。感官不知感知质料以上的东西，想象不能思索世界的属类，理智无法领悟单一的样式。人的理性无法达到深省的理智直观，但它却能分享神性的理智直观，所以，人不能僭越地他使用自己的理性，那样就会背离神性的世界。人应该懂得，自己作为分享神性的理智的存在物，作为能感领上帝的心灵，使自己的理性听命于神性的智慧是正当的，一如感觉和想象听命于理性一样。上帝是神圣的这一判断对理性的存在物来说是普遍的。

8、《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44页

自杀是对世界的呼救方式
自杀是人类自决的最高形式

现实世界本无意义而言，不得不在这世界生活的人又要求它有意义，这是个不可解决的矛盾，自杀就是因此而产生的。自杀者本身就有这样的悖论。他们并不知道，世界就是空虚，世界的意义需要依赖于人自己寻求到的信念去填充。不主动赋予世界以意义，反而向世界索求意义，必然会导致自杀。

9、《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532页

37. 推进虚无主义的思想家和拒斥虚无主义的思想家，同样都是心地真诚的人，同样都是含辛茹苦的人，这一现象让人感到惊异，而细思起来，又确为十分平常。我们显然不能说，推进和拒斥双方都同样合理，同样正确，都占有绝对的真值性，我们必得承认，有一方肯定陷入谬误，否则，我们将被迫认可：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真实可言，根本没有绝对的价值意义可言。

10、《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491页

34. 在荒诞哲学看来，人的生存是一个事实，人的在世界之中的实存本身就是一个事态，人的生命就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因而，人的认知和感受的形式就是事实形态的一个方面。“我知道的，可靠的，我不能否认的，我不能丢弃的，这些才算数。……”

11、《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306页

28. 在这里，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于，根据历史理性的法则，那些杀人的人类恩人有自己的价值根据：杀人是为了推动历史，带领世界走向目的地。这被看作是西方拯救意识的伟大变革：没有救世主，人类自己救自己。它包含着这样的理论内涵：传统的拯救意识是神而人，由耶稣的复活带来天国的爱的福音，但历史明爱不能救人类，只有靠人的历史行动。因而，拯救意识必须颠倒为人而神，只有用悲惨的鲜血和眼泪才能换来一个崭新的世界。由此，逻辑的推导必须是：人们要想在人世建立天国，建立新的耶路撒冷，就必须犯罪，允许杀戮，赞颂冷酷，消灭爱心。谁说我们不仁，我们就理直气壮地说：就是要不仁。

12、《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21页

8. 比较者根据这种主观性有权询问：历史中的文化传统价值是否能够解答现时历史提出的问题，是否能使现时历史中的生命找到真实的安身立命的根据。询问历史中的文化，询问另一形态的文化，就意味着要求它对现时历史负责，要求它给出确实可靠的解答。

13、《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167页

22. 在无论如何，不管从哪方面说，屈原都是被儒家信念逼死的。这一点没有冤枉儒家之道。人们会说，屈原怎么不改弦更张相信道家的学说呢？许多中国诗人不都是因此而得救了吗？但我们同样有理由说，屈原为什么要改宗呢？难道他不该执著于个体生命的奉献吗？

14、《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39页

11. 只有首先确认诗学（以及比较诗学）是对真实的意义的价值现象学追问，我才会接受比较诗学的说法。我始终关注的只是中西诗人的价值存在方式的可靠性，诗人对绝对价值意义的言说的真实性

，以及中西诗人所分别具有的不同价值意向的正当性。

15、《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25页

8. 比较者根据这种主观性有权询问：历史中的文化传统价值是否能够解答现时历史提出的问题，是否能使现时历史中的生命找到真实的安身立命的根据。询问历史中的文化，询问另一形态的文化，就意味着要求它对现时历史负责，要求它给出确实可靠的解答。

16、《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193页

25. 这种生命意向构成的助显就是拯救。“拯救”一词的词源(Salvus)本来就是治愈和复原的意思。拯救意味着有病的人、心灵破碎的人得痊愈，意味着人的救释和解放，即把人从种种自然形态的束缚中解救出来，从而使来自神圣生命的人重返神圣生命，活在神圣生命之中，参与神圣生命的神圣活动。

17、《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25页

9. 在这里，我们遇上了历史文化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有力抵抗。这两种当代强盛的学说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心理的历史和历史文化的传统。生活体验的形式和生命的形式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心理的历史建构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塑造，要摆脱它们是不可能的。因而，生命的价值意义只有在给定的心理结构文化传统中去获得。一句话，历史文化和历史建构的心理结构具有理性的特权。历史理性不容反驳、不可克服，否则都是无意义的妄念和小资产阶级的多愁善感。

18、《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422页

32. 可是，恶真的无法反抗吗？谁都不会轻易接受这一可悲的结论。但在卡夫卡看来，如果不接受这一可悲的结论，就会承受另一更可怕的后果：为善和正义而作恶，是恶上加恶。

19、《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533页

38. 作者的立场明确地站在拒斥虚无主义的立场，对话不是中立的，而是被引导的，因此，这场对话只能是一个开端，是继续推进虚无主义或继续拒斥虚无主义的开端。
39. 作者的态度表明，他坚决拒斥任何形态的虚无主义，不管这虚无主义以倡言绝对的价值虚无和相对性的面貌出现，还是以倡言任何可能的伪绝对价值的面貌出现。
40. 对话表明，中西方都存在虚无主义的信念和情怀，而中国的虚无主义远比西方的虚无主义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另一方面，中西方的虚无主义在现代世纪的极端推进，都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如果我们不来考虑虚无主义的问题，我们会坐卧不宁。

20、《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170页

24. 诗人屈原自杀之后，向中国诗人提出了一个出路何在的问题，这一问题显得异常急迫。然而，一再重复地陷入类似的苦闷和绝望之境的灵魂，经过艰难的摸索、怀疑、拒绝和辨认，很快确立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为自己的归宿铺平了一条充满欢乐情趣的道路——逍遥，自此以后，哪怕灵魂陷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凄苦无望和令人难以承受的无所适从，也不会有哪位大诗人愿意步屈原之后尘，象他那样“效彭咸水死”而自绝，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晚清民初诗人王国维。

21、《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20页

《拯救与逍遥》

7. 这种主观性据于种种偶然条件和个人因素，放纵个人的偏爱和憎恨：你生下来就接受洗礼，你就得信仰上帝；你从小穿的是长袍、平底鞋，饮的是“四书五经”之汁，你得无条件地坚信圣儒道仙，否则就是不孝子孙，“生盲大夫”。……一个人降生在东方还是西方，难道不是纯属偶然？难道不是一次命运的戏弄？人既不是鸡，也不是狗，必得无可奈何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人的存在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他能超越一切自然的必然性的束缚，真正的价值意义才是人的最终归属。

22、《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529页

35. 不管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走向神圣的救赎的道路，都是一种背负十字架的苦行，这是不可避免的；世界的形态无意义、是偶然，历史—社会形态中充满了谎言，为了使神圣的救赎不至于被世界的无意义性和遍布历史的谎言所歪曲，背负十字架必然是一种苦行。只是，这种苦行是值得的，因为只有神性的赎恩是最为神圣的，只有这神圣的至爱值得我们的生命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由于人灵是在这个世界之中，它就不得不穿过黑暗的深渊，上帝只聆听发自深渊的呼喊。这一历程但丁早已揭示过了：只有穿过地狱、炼狱，才能进入天国。我要再次重复的是，所谓地狱和天国，都不在这生命的此在之外，不在来生、来世，而在今生的生命。

23、《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539页

45. 本书之写作，是我清理自己的思路和信念的产物，批判的立场和态度首先是针对我自己的。所以，本书之批判首先是自我批判。凡读过《诗化哲学》的人不难看出这一点。

24、《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166页

21. 人的心性就足够了，当然就无需再去确立人之外的超绝的价值实在，人既然凭自己的自足万德的心体就能够顶天立地，自然就打倒了上帝。既然没有超绝的价值实在，既然人的实用理性和道德生命就足够了，干嘛还要提出“天问”呢？

25、《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71页

16. 没有爱、没有亲吻、没有宽恕、没有谦卑，这是丧失了神性存在的黑暗。人进入这黑暗的世界，正是由于人否弃了对上帝的信仰。西方诗人对各种价值信念和意义真实的怀疑，最终归结到对上帝的神圣存在的怀疑。

26、《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309页

29. 道家仙人把儒家的一大套仁义礼序学说的把戏看得很透，以至于走到彻底的非价值主义，并非完全没有原因。他们在一开始就把这套说教当作虚妄排除掉了。曹雪芹无庸与儒家实用道德形而上学展开一场争辩，是很自然的事，况且他也不可能有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把一切推到尽头，以使问题尖锐地提出来并力求予以解决的能力，正如屈原没有这种能力一样。

27、《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536页

44. 历史的厄运已一再警言，拒斥不应是无条件的，正如确信不是无条件的，我们不能背靠虚无去拒斥或确信。怀疑、拒斥或确信都应以工具理性和神圣的信仰为条件；清醒的理性批判是杜绝荒唐再度历史地发生的基本保障，使历史中的人不至遭受种种假象和谎言、谬误和伪理性（世界理性、历史理性、虚妄的道德性、非理性的虚无理性）的毒害；而这批判地运用的工具理性乃是为了确保神圣的爱的意向的超验性和现时性，从而使幸福、自由成为可能。历史的，磨难和苦涩使我们懂得，神圣的爱的意向才是人的存在的终极根基。

28、《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13页

4. 文化探究者把自己排除在现时意识之外，穿上一副客观性的甲冑，不是自欺欺人，就是甘愿把自己变成历史的僵尸，与之一同被埋葬于历史的事实性的坟墓里。

29、《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42页

12. 一般的自杀是对暧昧的世界感到绝望，诗人的自杀则起因于对自己的信念，也就是自己对世界所持的态度的绝望。这一内在事件表明，诗人对自己具有的世界作为整体的某种意义已彻底丧失了忠信。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诗人生活在科学理性和技术文明的进步之中，但在他们眼里，世界从来没有象现在的世界境况那样，显露出如此令人困惑不安的面目。

30、《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29页

10. 谁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带来了奇特的繁荣。

31、《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305页

27. 根据理性逻辑对历史和社会的分析推导出来的这一基本原则，如下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一类人（“名符其实的人”）有权力、有理由摧残、迫害、杀戮另一类人（顺从生活的人），因为他们是历史发展的障碍，是对生活来说全然无所谓的人，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用语来说，他们是“虱子”，理应由强者用两根指头随意捏死。

32、《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7页

2. 用以道德直观为根据的价值论去批判以知识论为根据的科学理性，既合理，也不合理。指责科学理性不能最终解决伦理问题，这当然正当；然而，要求科学理性来解决伦理价值的根本问题，本身就是理论上的谬误。西方现代哲学已经在这方面作过相当深入而有成效的批判，现当代儒学对此还大作文章喋喋不休，完全是无的放矢。况且，以道德贤圣自居蔑视科学理性在道德价值方面束手无策，不是件很可笑的事吗？

33、《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535页

43. “五四”一代所缺乏的恰给好是“四五”一代所品尝的“呕吐”过程。“四五”一代对历史的荒唐的领受要深切得多，苦涩得多，它是无数青年用鲜血和眼泪浸泡出来的。

34、《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12页

3. 事实性显然不能成为我们接受历史文化的无条件的根据，否则我们就得准备接受虚妄。并非所有的文化历史的事实都蕴涵着真实的价值。某种东西，并非由于它是历史事实，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有权迫使我们非接受它不可。划定意义与非意义的界限的力量，不是由历史的事实独占的。历史的事实是一回事，历史事实中的价值意义是另一回事。如果研究历史文化只是为了无条件地接受历史事实，那就意味着我们同意接受这些事实中实际存在着的愚蠢、谬误、荒唐和虚妄。中国近代盛行的考据之学把对文化历史的事实性研究当作灵魂的安慰，视为混舌依托是相当荒唐而且危险的。中国“信而好古”的传统教诲是一种再荒唐不过的信条。

35、《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5页

1. 西方精神文化传统并非只有科学理性，它们有自己的道德谱系，而且来尝比中国的道德谱系薄弱

《拯救与逍遥》

，因为它有至善至爱至美的神圣价值存在——上帝作为自己的根基。

36、《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535页

42. 的确，我们可以说，“五四”一代和“四五”一代的历史境遇并不类同。但问题在于，历史也并不是人们的价值追寻和抉择的最终根据。我们当然不能认可历史处境彻底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追寻，更不能盲目相信历史必然一类的胡言谎骗，否则，我们就得承认人的价值意向是毫无意义的，而现实的一切荒唐，只要是历史性的，就是正当的。

37、《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55页

15. 肯定世界的虚无的哲学，难免推导出谎言的信念。

38、《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401页

30. 鲁迅的觉醒的冷眼博得了世人的广泛称颂，仿佛使人豁然开朗，茅塞顿开：原来我们的生命竟然置身于价值的深渊之中。

39、《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471页

33. 这是一种情怀：个我的本然生命感才是最真实的，犹如出于实存情绪的个我的理知从来不会有错一样。

40、《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167页

23. 屈原并非为楚王遇难而死，也非为国家被秦国所亡而死，他早已对一个腐败的国家无留恋之情，尽管他一直热爱祖国。屈原是死于怀疑导致的绝望。

41、《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44页

14. 然而，为了信念而活的诗人终至于自杀了，虚无主义已侵入到人的骨髓，所有传统的价值信念都进入了末日审判的时代。现代诗学对此是否可以不闻不问呢？

42、《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19页

6. 人文价值科学关涉的是人的历史文化中的价值真实，在这里，重要的恰恰是不可度量的实事，我们显然不能把生活世界中的价值真实贬低为自然科学的实验对象。由此，人文价值科学也就不能应用度量性的工具手段。因而，人文价值科学不能也无须要求获得自然科学一类的客观性。如果着意追求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就等于彻底消除了人文价值科学的存在前提。

43、《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44页

13. 说出这话的歌德本人并没有自杀，只让维特死了一次。诗人自己还不能接受自杀。他还有自己所坚持的或正在确立的信念。诗人笔下的人物可以为了信念而死，而诗人自己却生来是为着信念而活的。加缪说得对，确实不曾有过为形而上学的问题争辩而死的人。

44、《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140页

19. 从儒家的入世到道家的逍遥具有内在的逻辑必然联系。所谓的儒道互补不是任意的，而是必然

《拯救与逍遥》

的，否则不知多少中国诗人会死于非命。

45、《拯救与逍遥》的笔记-第245页

26. 事实上，从古至今诗人都在不断地反抗历史的规定，以自己的存在的尖锐性突进到某种价值形态中去，从而在非价值形态的历史中确立价值。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抓住诗人的主观态度不放。而且，诗人所持有的信念和价值态度，确实又成为后人敬慕的典范，对此诗人是理应负责的。

《拯救与逍遥》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